

悼念

我們得到下面級社的通知，對去世的校友表示深切的哀悼，並向他們的家屬表示誠摯的慰問。

培社：謝維真

鵬社(1939)：沈厚堅、黃錦波、葉彼得

磐社(1941)：黃秀貞（黃啟明校長之女）

昭社(1944)：黃澍基、林國安

雁社(1946)：楊國祥、劉驥、黃桂潮、簡仕廉、伍少文、林萬濤、林烈彌

弘社(1950)：黃保璇、馮耀樂、劉仁富、翁家賢

明社(1951)：關 洪

偉社(1952)：廖顯棕

鵬社(39) 悼念廣州培正鵬社離世同仁

我社沈厚堅、黃錦波、葉彼得三位同學先後於去年5月30日，今年11月2日和11月8日分別在香港、廣州因病逝世，我社同仁深表哀悼，並向他們的家屬致以親切的慰問。他們在培正畢業後，先後考入國內名牌大學，畢業後分別從事教育、經濟、醫務工作，積極為人民服務，建樹殊多。他們熱愛培正母校，熱愛鵬社，積極參加母校、同學會和社的活動，與同學友善，發揮紅藍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我們永遠懷念他們。安息吧！沈厚堅、黃錦波、葉彼得同學。

【附】葉彼得教授生平簡介——中山二院兒科

葉彼得教授是我國著名兒科專家，醫學教育名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1946年畢業於華西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任華西醫學院工作；1948年起一直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兒科（當時為博濟醫院）兒科工作，歷任住院醫師、助教，主治醫師、講師，副主任醫師、副教授、主任醫師、教授，兒科和兒科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兼任中華醫學會兒科分會常委（1986-1993），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兒科學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1985-1989）。

葉彼得教授是一位傑出的醫學教育名師。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辛勤耕耘，桃李滿天下。他對教學工作極其認真負責，幾十年如一日，對每一節課都認真、細緻做好準備，認真做好教案，並自己對着鏡子進行預講。由於他的勤奮

再加上他的講課天才，因此他的講課總是那麼生動、精彩、條理清楚，引人入勝。教學效果良好，深得全校師生的好評。他還經常到國內其他省市講學，他的精彩演講總是得到好評，因此成為全校乃至全國有名的優秀講課者之一。他對教育的貢獻還體現在對兒科學教材的編寫，他作為衛生部規劃教材的編委，參加了第二、四版統編教材的編寫，以極其認真、負責態度，對每一個字、甚至標點符號都認真斟酌，逐一修改。所參編教材均獲優秀教材獎。

葉彼得教授是一代名醫。他扎實的基本功、淵博的知識，科學的邏輯思維和豐富的臨床經驗，很好地為臨床解決疑難病例的診斷和治療，挽救了無效危重兒童的生命。他的查房分析病例，能很好結合病人的實際，層次分明、深入淺出，既全面又重點突出，讓所有聽他查房的醫師都受益匪淺，無不贊賞他的名醫風範。葉彼得教授是著名醫學科學家。他是我省小兒血液病專業奠基人，也是全國小兒血液病專業先驅者之一。他於1958年在中山二院率先組建兒科血液病實驗室，隨後創建了廣東省兒科分會小兒血液病專業組織，對我省甚至全國小兒血液病專業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在他的帶領下，我院兒科血液病專業開展了對小兒貧血，尤其是溶血性貧血的研究，很多項目都處於國內領先地位，其研究成果於1989年獲得國家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獎。並促進了我省對先天性溶血性貧血的研究，使我省在此領域處於領先水平。

訃告

頃接 謝宜安 夫人孔慈來電，驚悉我社謝宜安同學因病，不幸於 2008年2月21日下午11:30與世長辭。我社同寅深表哀悼。謝同學生前熱心社務，為我社作了不少工作，貢獻良多。他關愛同學，熱心助人，無論紅白二事，有求於他，均悉力以赴。從中他亦洞悉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故叮囑家人，辦他喪事，切勿搞形式主義。遵照他的遺願，入殮時穿上女兒送之心愛外套，結上誠社領呔。火化后，由幾位至親，買舟出海，送他最后一程，將骨灰撒在香港東龍島海面。

他叮囑大家，要珍惜眼前人，要愛別人。

孔慈女士多謝大家的關心，並將訃告轉知廣州誠社同學。她表示將不出席任何追悼會。願 謝宜安同學永息勞苦，遺愛長存！

香港培正誠社同寅鞠躬 2008.3.6



懷念黃澍基 (昭社44) 同學

黃澍基(洛奇)同學不幸於2007年7月31日與世長辭。(繼林賢江同學去世剛滿周年之日，誠屬巧合。)灣區例會常客又弱一員，不勝痛惜！

安息禮拜於8月4日上午11時假灣區 EMERYVILLE 鎮 PACIFIC INTERMENT SERVICE 舉行。由屋崙華人自理浸信會郭牧師主持。儀式莊嚴肅穆。到會者均為至親人士，昭社成員七位參加，其他社友因行動或交通不便未能出席，謹此致歉，郭牧師略述黃君生平，正好補充吾輩對黃君認識之不足，十分感激。(黃君生平另由家屬撰文詳細刊出)

黃君自幼就讀附屬培正之幼稚園直至高中畢業，從未離開。時值戰亂校址四處遷徙，實屬不易，可見黃君對母校之情深。黃君在校時予人印象是天資剛直，勇於助人，而受助時亦毫不諱言。對運動特別喜愛，舉凡田徑球類無一不能無一不精，為校中運動健將。又愛好音樂。待人接物極受同學們敬重。



黃君去世前三天與惠德及施國權兩位社友前往探訪

憶在籌辦昭社慶祝金禧期間，黃君曾經注入無限精力，聯繫灣區社友又發信函召集遠地同窗，致使三藩市的昭社金禧活動，是繼香港、廣州及番禺等地舉行的另一大型慶祝活動，成績斐然。參加香港活動後，黃君更聯同多位社友共赴澳門緬懷隔別多年的校園，黃君愛社愛校之精神令人敬佩。

黃君對扶掖後輩更不遺餘力，曾為廣州母校組織橋牌會及壘球隊，出錢出力之事蹟或鮮為人所知，而知者對橋牌之組織稍有微言，謂橋牌只會荒廢學業助長賭博。唯是集會結社既得校方之允准自無不妥，作為課餘之活動亦當不為過也。

黃君在近兩三年間發覺罹患肺癌，自知難以康復，唯對每月例會從未嘗放棄，盡可能內還勉強出席，席間更表達只望能目睹2008年在北京舉辦之奧運會便心滿意足，惜天不假年希望落空，不勝惋惜！

盧廣瀚

秋草獨尋人去後

老瑞鏗

去年九月，我和澍基握別，不料十個月後，他竟逝去。

我雖然知道他的病治癒之望甚微，但又覺是他不會走得早。我之所以作如是想，不僅出自友情的祝願；更因為他對疾病能處之泰然，情緒樂觀；還因為今年春節時，我打電話問候他，他還說他的病沒有太明顯發展。他說話有力，談吐如常。世事無情，真難逆料。

澍基早年在國內工作，由於為政錯失，使他生涯坎坷。歲月蹉跎，青春不再，令人扼腕痛惜。八十年代，他年華將暮，飄泊天涯，定居美國。他能吃苦耐勞，終能立足。他雖身在國外，同國內的同學常有聯繫。我本人就從他那裏接到過不少書信、照片等，從而獲得各種訊息，異常珍貴。使我了解到國外，特別是美西各位同學的情況和大家相聚時的情景。這些是我所渴望知道的。

他去美國後，我和他有過四次相聚。每次都給我深刻的感受。

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去美加探親。他住在奧克蘭，我住在硅谷一個名叫Milpitas的小鎮，他多次來探望我。參加灣區同學的月例會和在愛玲家的聚會等，都是由他接送的。如許幫助，不知凡幾。我原來無地理概念，不知奧克

蘭的方位遠近。後來偶然查閱百科全書，才知道聖弗蘭西斯科灣長60哩，最寬處有12哩。這樣算起來，他來看我，每次要開車百餘哩。如果去參加聚會就更遠了。雖說在美國開車很平常，但我們並非比鄰。屢次接送，非常不易。那一年，他後花園的檸檬碩果累累。有一天，他摘了一袋檸檬，專門駕車來送給我。情意之深，由此可見。他還與我共賞灣區同學金禧錄影。我回國時，他惦念著遠在四川成都的黃家源同學，托我帶一盤灣區同學金禧錄影帶給他。此時家源疾病纏身，起居不便。澍基想與他分享金禧的快樂。我當然責無旁貸。沒想到當時國內管制很嚴。我去郵局寄像影帶時，竟被索要文化局的批文，無批文不受理。風氣之閉塞，一至於此。我當然不會也不可能去申請什麼批文。後來適逢黃家源有親戚來北京出差，托他帶回去，才解決了這道難題。不久，澍基回國，他特意從廣州去四川探望黃家源，熱情慰問，暢談甚歡，對國外同學的近況，灣區金禧的盛典作一一介紹。澍基對同學的關切，可見一斑。家源遠在巴蜀，交通不便，我猜想家源最後見到的同學可能就是澍基。

二〇〇〇年春，美加同學發起加勒比海之遊。當年夏天，我又一次去美國，聽說參加者有數十人之眾。澍基在

這人數眾多的旅遊中，舉凡組織、聯絡、交通、票務等事項，無不親力親為，為大家服務，貢獻良多。期間，澍基告訴我嘉卉在美國。我和嘉卉上一次見面是在今朝家裏，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想不到在美國卻因澍基而得與嘉卉有兩次會晤。其時我已退息十三年，而嘉卉仍在勤勞工作，可敬可佩。鑽禧前夕，我曾去陵園祭奠今翺，沒想到竟發現嘉卉亦長眠於此。

二〇〇五年春末夏初，他再次回國。他到廣州後，曾寫信給一些同學，呼籲大家用自己的知識或財力幫助培正中學發展。後來他來北京探親，並看望在京的同學們。未幾，他取道廣州前往香港後。我以為他從香港返回美國，不料他到香港後，又返回廣州，在培正中學開辦橋牌學習班，向在校同學傳授最新的橋牌技術。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幫助培正中學發展的承諾。而這一行動，他在北京時從未提起。直至秋天，學校開課，澍基才結束學習班，返回美國。

二〇〇六年，我第三次去美加。同澍基通電話，得知

他已確診為肺癌晚期，醫生認為已不能手術。我立即前往探望。他卻談笑風生，樂觀豁達，絲毫沒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表現。他還向我通報了穗森、漪汶、賢江、相繼凋零的消息，並深表惋惜。他仿佛忘記了自己重病在身。他的樂觀情緒使我稍感安慰。後來我從加拿大回來，取道三藩市回國時再次去看望他。此時，適逢灣區同學月例會之日，他邀我前去參加。餐罷，他一直送我到餐廳門口。我同他道別並互致珍重。我上車後，他忽然拉住車窗，他說還要找個時間同我飲茶。我明白，他是懷著「別時容易見時難」的心情，恐怕再見無由而作此邀請的。我們相見的最後一幕就定格在這裏。後來因為我的機票日期已定，家人要上班，無暇相送，澍基亦不能駕車，只好作罷。今日沉思前事，能不愴然。

回顧幾十年的交往，我覺得澍基的風範而為我所不及者，就是他愛培正、愛昭社，樂於助人。這是追念他的時候所深深感到的。

註：本文題目摘自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

悼旭社(62) 范思碕、周維傑同學

回溯一九五九年，我們一批黃毛小子升上初三信，課室正位於高座三樓尾，對正浸會書院和大操場，風景絕佳。班上多了一位忠厚而友善的新同學范思碕，當時我家住尖沙咀加連威老道，而范則住在後面的嘉蘭園，上學下課一起坐七號巴士，很快便成老友，一起打乒乓、荔灣划艇、打康樂棋、打橋牌等。記得同遊的還有余凡、彭耀國、方杰、李寧等。高中時我與范不同班，但由於街坊關係，我常去他家玩，與他父母弟妹及周維傑都混得很熟了。

記得一天自我家後窗向上望，見對面嘉蘭園一樓宇天台上，有一人在放鴿子。後來見得多了，才發現此君名周維傑，乃是望班同學與范思碕同班，租住范四樓隔鄰單位一房，他在天台上造了一個籠養了多隻白鴿。我當時亦曾去天台上看過他放白鴿呢！

那年代大批家庭從大陸（特別是上海）移居香港。很多上海仔中學生都入了培正。周維傑亦是其中之一。周在大陸已練體操，手瓜起展，雄姿凜凜，運動場上表演雙槓，可說獨一無二，出盡鋒頭，當時他的肌肉有時還成為我們的取笑目標。

高中時范父不幸病逝，范更以長子身份照顧家人，縱使如此，同甘共苦快樂時光，今仍留腦。畢業之後還記得與他同登獅子山傻瓜塔，相片仍存。

周畢業後即往銀行工作直至退休，可謂忠心不二。范則工作數年後往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完成電機工程。我後來赴加時他亦極力叫我去多倫多。因當時已有很多同學就讀安省之大學，可謂熱鬧非凡。往後多年，時有大食會、電影、宵夜、同學會聚餐、郊遊、

派對、婚宴等，真是最美好的時光。同遊者如任駿超、莫杖裘、余兆文、黃志宏、鄭愛華、周美保、斐霞雲、蘇健興、岑伯康、蕭蔭權、吳秉渝、余承繁、傅申根、胡遜偉等等，可謂人材鼎盛。當時吾輩適在壯年，事業家庭兼顧，同學們可謂目睹彼此生命里程。另一方面，周維傑本着一腔熱誠，在港掌管旭社財務，25周年加冕，周更為主力籌組者，居功至偉。他為人正直認真，管財務實不作第二人想。數年前退休專研歌唱及交際舞，表演水平獨領風騷。如今音容沉寂，能不令同學痛惜！

范思碕多年任職工程顧問公司，可謂鞠躬盡瘁，工作至病倒，可見責任感之強，對工作之專業精神，真乃可敬可嘆！2004年三藩市旭社重聚，周維傑、范思碕亦有參加，且合照留念，不料翌年，范即胰臟癌病發，僅數月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病逝於多倫多醫院，留下妻子及三兒女。病危之際，范能以勇氣面對，唯願次子能在學業更進一步，可謂畢生以家庭為重。出殯之日，數百人出席，須開兩個靈堂才夠，可見其交遊之廣，人緣之佳。如今每逢聚會，怎能不懷念范之高談闊論也。

萬料不及一年內又傳周維傑肺癌病倒香港，病榻之中尤作一致同學信，以紓豁然面對命運之情而不懼，令人非常感動，誠勇者也。

范周兩位同學，廣結人緣，向為旭社中堅份子。病危之際，同學紛紛致電問候、探訪、電郵鼓勵，充份表現友情之可貴。如今斯人已逝，我等痛失良朋，憶及四十餘年並肩，無語問蒼天何其不假年也。

程慶生

懷念我的銳社 (58) 良友朱柏濂教授

陳國維

2008年三月中旬，朱柏濂教授，我們培正銳社一位傑出的學者，同頑疾相持年餘之後，與世長辭，安息主懷。他那豐盛的在世人生，雖然自此劃上休止符，他的影響仍將長期留在人間。

早年我在培正唸中學銳社光班時，已風聞柏濂的大名，因為他在校刊中的「優異生」名單中常常榜上有名。我們第一次相識，彼此一見如故，那是在一九五九年在澳洲悉尼的培正同學會上，距今已經是差不多半個世紀前的事了。

柏濂自培正高中畢業後，去了澳洲，入讀「新南威爾斯大學」電機工程系，起初十分聽不慣澳洲口音，上課時難於明瞭，頗感納悶和孤獨。正當他開始不知如何是好時，同班鄰座的澳洲青年Harry Leesment主動跟他交朋友。從此Harry不但成為他的英語會話「私人老師」，他的父母更欣然接待這名海外遊子，讓他寄住在他們溫暖的家中。原來他們是個滿有愛心的基督教家庭，待這陌生中國人如己出，令人感動。朱柏濂曾對我說，培正教育是他認識基督教的啟蒙，Leesment這美好的一家才是他在大學時決定受洗歸信的主要因素。他說：正是這股奇妙的力量，聖靈的感召，日後大大地推動他對信仰的渴求和奉獻。電機工程畢業後，柏濂繼續深造，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銜，並在新南威爾斯大學母校執教。由於表現卓越，從講師、副教授、一路晉升至正教授，不久更成為悉尼學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同一時期，Harry轉入神學，立志以傳教作為終生奉獻。懷著一個感恩和敬虔的心，柏濂在工餘時也積極投入各類教會活動，帶領亞洲學生團契，甚至鼓起勇氣，在唐人街鬧市孤站在蘋果箱上，向路過的華僑疾呼，宣講上帝的福音。

那時的悉尼培正同學會，曾多次與真光同學會合辦郊遊或聚餐等活動。從中，柏濂開始和這間名女校的Eva「拍拖」——由於同學們習慣喜愛乘坐Ah Pak的汽車，駕駛時他們「拍」的時候，我們在後座作「電燈膽」「拖」著，笑聲不絕於耳。1967年，他倆有情人終成眷屬，伴郎是培正學弟陳東坡君。Eva肆業於著名的「悉尼音樂學院」，具鋼琴高深造詣。柏濂平日除欣賞古典西洋音樂之外，有時也聽聽懷舊粵曲，看看電視的球賽，逗逗兒女，生活稱心寫意。兩子女在良好家庭教養的熏陶下，陸續長大成人。如今，長女「德信」Evelyn為資深藥劑師，女婿為傳媒人，兒子「德望」Desmond為麻醉專科醫生，又是他們教會英語青年部的領袖，不時在主日上台講道，令老懷大慰。媳婦是位牙科醫生，他的孫兒已達五位，亦於願足矣！

早年在澳洲，他和我都曾是悉尼西區Ashfield Baptist Church「灰田浸信會」亞洲留學生團契的成員。每主日澳洲牧師為一大批來自香港和星馬的華人學生安排活動。記得在當中的靈修時間，柏濂和我曾特別為中國大陸之基督教復興而切切禱告，因為那年代國內政治掛帥，宗教飽受壓抑。當時真想不到大陸會出現近年的教會興旺，實在是當年我們未敢冀望，是遠遠超出我們所想所求的。後來他轉了去服侍「北悉尼華人教會」。1978年，他連同該會四個家庭往外植堂，創立West Sydne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西悉尼華人基督教會」，為拓墾聖工投下莫大的心力，並被推選為執事會主席。隨後他的事奉範圍不斷擴闊，成為「全悉尼市華人基督教聯會」的主席。1987年，他組織「泛澳洲華人基督教聯會」首屆全國大會。1993年，他參予建立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Australia (CCMA)「世界中信」之澳洲分會，後來擔任該會主席多年。期間他不辭勞苦，多次率領中信短宣隊，前往南太平洋諸島國如所羅門和溫尼雅圖等地，向當地華僑傳揚福音，帶給他們同胞的溫暖和上帝的祝福。有當地人士受感召而獻身主工，為僑胞的得救播下了種子。千禧年後，他曾從香港飛往昆明市，匯合正在雲南省作義工的上述摯友Harry Leesment牧師，參予建立盲人學校和教會的事工，帶出真誠的同胞關愛，意義非凡，令我萬分欽佩。

隨著不懈的努力和經驗的累積，柏濂在「光電」這門新興科學很快開創了新局面，日漸引起先進國家的注視，時常邀請他作學術交流。柏濂屢次強調，他的智慧之來源就是神的恩賜，他一切好處不在主以外。七十年代末，他在新南威爾斯大學創立全澳洲第一間「光纖研究所」，引入該國當時最先進的光纖實驗儀器。1981年我在悉尼坐「移民監」期間，參觀過他那滿佈五光十色器材的「血管栓塞激光醫療實驗室」，心中十分贊嘆我這銳社校友的科研進取精神。他一方面潛心學術研究，一方面不斷培養人才。多年以來，發表於國際科研權威刊物的論文超過四百篇，個人培養出的博士達四十人，(部份是慕名而來的大陸子弟)，被公認為南半球光纖領域之首席，實在是培正之榮，華人之光。

他發明了量度「光纖折射標準」Refractive-Index Profiles of Fibre Preforms的技術，從而計算出光纖維的光波角度，這成果被廣泛地應用在日常商業市場上。他解決了「孤子互動」Soliton Reaction的難題，使光纖內的光波在傳送時不再糾纏一起，奠下「孤子通信」Soliton Communication的根基，藉此大大增強光纖維傳遞信號的能量。此外，還有大量筆者不明瞭但備受世界各地學術界重視的成就，創新技術如 Non-linear Optical Switches (to move fibre signals between channels), Polymer-fibre Bragg Gratings (to block selected signals within a fibre), Waveguide Couplers (to bring optical signals together), and Polymer Optical-fibre Technology (比玻璃光纖更經濟和更有利光感應的「聚合體光纖技術」)等等，影響深遠。為此，迎接千禧年時，他榮獲澳洲總理頒授「澳洲國家百年勳章」Centenary Medal of Australia。他也曾是多次國際科研會議的召集人，多國光電學術刊物的顧問編輯，超級跨國企業BHP、澳洲Telecom、澳洲國防部等等的顧問。他擁有五項發明的商業專利，如果把握機會藉此從商，利潤必定十分豐厚。然而，他始終認為學術和信仰才是他的人生追求，不為物利所動。

2001年他返回香港，在「城市大學」任職Photronic Centre「光電研究中心」的主管，暨HK Science Park沙田「香港科學園」光電中心的顧問，與「光纖之父」高崑博士時有交流。某年還被邀到他向海的家欣賞中秋節維港煙花匯演。在港他在百忙中，仍念念不忘傳道大使命。我和妻曾聆聽他在浸會大學和屯門教會的証道。他也曾帶我去恭聽

楊振寧博士和一位劍橋大學神學家，主題為「當宗教與科學對話」的精彩交流會。這位諾貝爾得獎者坦承不排除宇宙創造的實在，和世人對全能者的倚靠，引人深思。柏濂曾在「香港科學館」和「香港電台」，向廣大市民作深入淺出的光電應用演講，並曾返回香港母校培正同學會作專題講話，讓同學們進一步認識光電。更值得國人重視的，是柏濂對國內科研學術的關心和支持，體現了他常存的「中國心」。歷年以來，他熱心地接受無數次邀請，前往中國重點大學和研究機構去講學或交流，包括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台灣新竹科學園等。他對我憶述，一次在南京大學研討會完畢後，他特意帶同一些當地師生訪問全國著名的「南京金陵神學院」，途中在車子裏，教他們共唱讚美詩，心情份外暢快。今次中國駐悉尼領事出席了柏濂的喪禮，說明國家對他為民族作貢獻的肯定。懷著一腔家鄉情，他也曾出力促進粵港兩地的科技合作，多次奔走於「大珠三角」各學府和IT資訊企業之間。我就是跟隨他所率領的城市大學電子工程教授訪問團，才有難得的機會參觀了「深圳科技園」的全國電訊龍頭企業「華為」及「中興通信」等知名大機構，眼界大開。

柏濂出生於廣東台山縣。對祖國，他素有一顆赤子之心，一向格外關注國內發展情況，時常想為同胞們的福祉盡一分力。去年初，當他獲悉我和妻參加了助學組織「苗圃行動」為大陸山區貧困學童而舉辦的「行路上廣州」之活動時，立即自動開來款額可觀的支票。2005年三月，我們相約參加了港人抗議「日本反華軍國主義復辟」的大遊行，他破例一口氣行了兩句餘鐘，殊不簡單。說起來，柏濂和我不同，自小熱愛中華民族。少年時在培正，我們曾經懷著沉重的心情，從歷史課本中，讀到晚清時外國列強對我國的欺凌。我們親身先後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動盪歲月：——抗日戰爭的苦難，國共內戰的悲痛，目睹了階級鬥爭的殘酷，大躍進的惡果，政團內耗的創傷，文化大革命的禍害，六四悲劇的痛心疾首。幸好終於否極泰來，開放改革迎來了這三十年國內翻天覆地的正面發展。其中的驕人成就，如太空載人飛行和劉翔打破田徑世界紀錄等等。帶給我們無限的欣慰和振奮，中國人再次站立起來了。我們能有幸生活在這民族復興的年代而向神感恩。柏濂和我都認為愛國不等同愛黨，對政府，我們知識份子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我們都清醒地認識到，國內尚有一大堆非解決不可的棘手問題，如黑金貪腐，環境惡化，能源短缺，分配不均，道德不彰，內憂外患等等。但對國家總體前景，我們還是審慎樂觀的。考慮到客觀國際條件的局限，尤其是一些不甘心看見中國富強的外國滲透勢力，柏濂和我都體諒到，今日中國大陸尚未能承受得起言論集會的完全自由。試想，倘若教會可以不受監管地在街頭佈道，境外支撐的諸多政治組織如藏獨疆獨法輪功等。勢必乘機作亂，以言惑眾，星火燎原，危及大局穩定。對發展中國家如中國而論，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前途，沒有前途就沒有希望了。

柏濂和我都是「蛀書蟲」，時常手不釋卷。禮拜天大多聯同在「九龍塘宣道會」崇拜，午膳之後，我們時常沉醉在城市大學的圖書館裏，有時一晃就幾小時，樂而忘返。他住所最吸引我的，是滿目書架上的眾多書籍，尤其是有關中國近代變遷史料和人物誌，都是我的至愛。我們對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利馬竇來華，清末北洋艦隊和早期留學生等等的興趣甚濃，並交換這類書本，相互切磋，雖然其實他的智慧遠在我之上。他固然是科研的精英，也很有文學的

頭腦，無論各門哲學，世界宗教，古人類史，諸子百家等。他都很有很深的認識，因而跟他日常閑談，有時對我亦有所啟發。他天賦出眾的記憶力，分析力和邏輯性。從醫學角度，我想像他的大腦皮層特別厚，摺紋特別深，聯接特別多。記得2005年春，我們一齊旅遊越南，見到街上越南文的拉丁字，他很快便思考出當中的規律和字義，不禁令我驚訝他的敏捷思路和語文天份，也說明歷史上受人景仰的人文哲學家，大多亦是語言天才。如果昔日他不是選擇攻讀理科，也會成為一位優秀的人文學家呢！

接受了培正母校多年的孕育，柏濂十分關心母校，一直以身為紅藍兒女為榮，珍惜同學和老師間的來往。2006年底，他熱情地參加了本港銳社同學聚餐會，久別重逢回港探親公幹的辜昭湖、周朝漢、倪家傑等。和本港的陳子樂、陳力行、薛孔奇、林楷培、蕭亮雄、劉鎮祥、吳懿徽、金聖華、關博文、賴包亮、陳加杰、李冠南、孫述寰等各老友，談今說舊，共渡團聚良辰。翌年三月的銳社聚餐，請來了尊敬的劉彩恩老師，柏濂因早預約會，未能出席。事後我相約他，另行攜妻往麥當奴道專誠拜訪劉老師，重溫師生情誼。怎料那次他需借助拐杖步行，原來是隱性腫瘤擴散的先兆，重聚竟成為永訣，令人慨歎。

柏濂因工作長期離家生活，又多公務宴請，飲食不很正常，他又愛美食佳餚，平日埋頭科研，長期身困斗室，疏於運動，體型日顯發福，我和妻鼓勵他多點室外活動。我們在越南遊覽，穿過越戰「古芝地洞」時，他頗吃力地彎腰，跟著大隊跪爬，完成全程，表現甚佳。在「頭頓市耶穌山」，他微喘著氣，步上全部幾百級石階，贏得我們掌聲。前年身體大檢查，才知血脂超標，心導管查出冠狀動脈已嚴重阻塞，必須進行兩次「心血管內置支架手術」stenting，那時我們和Eva不住禱告，守候在手術室門外，給他打氣，渡過難關。當大家把注意焦點放在他心臟時，莫名其妙的腫瘤卻不動聲色地形成了。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只能交托給神。為了便於治療和接近兒孫，去年春他們搬回澳洲的家。最難得的是，危難當前，在身體飽受摧殘之下，柏濂仍是那麼坦然無懼，堅持對天父無比的信心，散發出那只能在耶穌基督裏才有的平安。在後期體力已極為虛弱時，仍接受「恩雨之聲」電視台的專輯訪問，以生命影響生命，惠及他人，為主作出美好見證。這一年來，Eva全日侍候，悉心照顧，任勞任怨，同心禱告，患難顯真情，流露出華人傳統女性的美德，柏濂深為感動，向我細吐心聲，表示經歷考驗，他衷心欣賞和感激妻子對他的真愛。令親友欣慰的是，去年聖誕節，趁病情稍緩時，他們全家連兒孫十餘人乘搭郵輪遊覽南太平洋島嶼包括曾短宣過的溫尼雅圖。原來合家郵輪旅行是柏濂多年的願望，這次成行圓願，應該是神的特別恩典。

上屆雅典奧運第一日，當我獲悉中國射擊選手杜麗榮獲首面金牌的好消息時，心中深感鼓舞，而第一位我要分享這喜訊的人就是朱柏濂，我知道他會產生內心共鳴的。今年北京奧運盛會，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頭等大事，沒有他的共享，我的感受將很不一樣。當年美國911襲擊的突發性大新聞，第一個告訴他的人也是我。我們一向對事物的看法差不多相若，持相近的價值觀。關乎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時常願意分享，有時並會分擔。曾經有幾次，我就一些議題寫信給台海兩岸執政當局，未寄出之前都找他過目和提意見。

雖然我也受洗信主已數十載，信仰問題上仍然不時遇上未明之處，第一個想請教的人就是朱柏濂，經他耐心指

點迷津，我多能走出雲霧見青天，靈命得以繼續成長。科學知識上的問題更不用說了。孩子們自幼以來，Uncle Pak便是他們知識和宗教導師。我深深感到，他是我在生活上的益友，是我在生命上的良師。十一年前，我的事業正如日方中，家庭生活美滿，忽然罹患腫瘤，頓時晴天霹靂，身心俱受嚴峻打擊。柏濂來信懇切鼓勵



07年春和陳國維拜訪劉彩恩老師。

和安慰，特別引用聖經裏一直帶領他人生的至關重要座右銘，就是羅馬書八章金句：「誰能使我們和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現在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愛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感謝主，神寶貴的話語，親友不斷的關懷和家人無盡的支持，大大促進了我的康服，而這是與柏濂分不開的。數年前的銀婚感恩宴上，我和妻特意恭請他作致詞嘉賓，及薛孔奇同學作謝禱嘉賓。培正手足於我的家庭，向來處在一個重要位置。

柏濂和我在澳洲結識的培正光社鄭應毅同學，同是幾十年的深交，彼此情誼甚篤。雖然他的家遠在加拿大渥太華，常常專程回港探望我們。去年冬他盛意拳拳，邀請柏



朱教授06年向浸會大學學生演講，介紹「達文西密碼」錯漏之處。

濂和我在今夏到他府上共渡一個長長假期，共享珍貴友情，重溫學生時代的好時光。我們固然心領了，但世事變幻無常，有誰預先知曉自己的年日呢？正如雅各書四章指出：「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如今柏濂已離我們而去，另一位銳社好友，美南喬治亞大學資深地理系教授羅楚鵬兄，亦在不久前謝世，不禁令人萬分惆悵。唏噓之餘，我們仍應緊記培正教育送給我們其中一個關鍵人生真理：我們來源於主，在世上要倚靠主，最終亦回歸於主。對於神的兒女，所發生的事都是天父的美意。面對患難時，我們往往一時未能明白。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我們遲早終會明白的。

2008年三月，香港

懷念1958銳社朱柏濂學兄

林翠玲(1966皓社)

記得第一次與學兄相遇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於1979年時雪梨的華人教會並沒有現在的多，經鄰居友人的介紹，去到一間很近住處的華人教會，這教會是北雪梨母會的分支，即現在的西雪梨華人教會，朱學兄是開荒者之一，那時聚會人數祇是幾十人，第一次見面時，受到學兄及他太太EVA很友善的歡迎，傾談之下，知道他也是培正同學，更加有親切感，不覺便在這教會渡過了近三十年之久，當時教會並沒有牧師，朱學兄也間中擔任講道及負責文書的工作，他自己則在新南威爾斯(N.S.W.)大學任講師，在三十多年前，澳洲的華人講師為數實在不多，其成就已可見一斑，跟着不久，朱學兄申請了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舉家四人去美國深造，回來後便升為教授，一直任職於新南威爾斯大學至退休。

朱柏濂學兄是一位典型的學者，他的藏書便是他的寶庫，可以說是卷不離手，很多時都看書到深夜，他是用盡每一分每一秒的人，有時覺得睡眠的時間也是浪費，他常受到全球光纖界機構的邀請，不停的到外國及中國講學，真是坐飛機的次數有如坐巴士，不禁佩服他的精力，記得曾問及他的退休計劃，他說：「我不會退休的，我會做到drop dead那一天」，想不到竟如了他所說。除了忙於大學的研究工作外，在宗教上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在我們教會擔任主席多年，在辭退了主席的職位後，又參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的工作，並任澳洲方面的主席，很多時在百忙

中抽空參加短宣隊去紐西蘭、菲濟群島一帶傳道。

每位成功的男士，背後一定有一位女性支持，朱學兄也不例外，他有一位很能幹的太太EVA為他打理一切，使他無後顧之憂，他常開玩笑的說，我祇是在寄居，一雙兒女都教養得很好，並學有所成，女兒德信是藥劑師，兒子德望是麻醉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我也有幸參加他兩位兒女的婚禮。

當朱學兄生活於雪梨時，除了他出國，差不多每個主日都會在教會與他見面，後來教會成立了牧養關懷小組，他與EVA也是我們成員之一，每月輪流到每位組員家中聚會，友誼更增進了一步，對他有更深的認識，間中也有與他一同參加培正同學的聚餐。

在這悠長的歲月，朱學兄給我的印象是多麼的深刻，我很欣賞他很多品格上的美德，如平易近人，樂於助人，謙虛隨和，雖然他在學術上有驕人的成就，但從來沒有炫耀，無絲毫架子，又是這樣的博學多才，科學、文學、社會動態都有很深的認識，每次與他交談都是娓娓動聽，好像打開了知識的寶庫，得益良多，他除了健談外，很多時是談笑風生，很有幽默感，記得有一次我們大家第一次去一位組員家中，屋子佈置很華麗，我們都嘆為觀止，那位組員說：「這是我契爺的房子。」朱學兄開玩笑的問：「你契爺還收契仔嗎？」引得大家都哄堂大笑，他對聖經是這麼的熟悉，每次查經，都有很獨特的見解，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他去了香港就職後，我們小組都很懷念他，有點失落感，在這期間，他每年都來雪梨幾次，除了探親外，在短短的日子，百忙中也抽空去參予「中信」雜誌的包裝，又不時參加短宣隊的出隊傳道，對神的事工一點沒有怠慢。

他在香港城市大學任職期間，我和先生曾回港，除了參觀他在大學的研究室外，並在他宿舍住了幾天，每天他都親自為我們預備早餐，大家一同吃了早餐才上班，又把自己的床讓了給我倆，自己在客房睡，在卻之不恭之餘，深為感動。又款待我們在大學的貴賓廳餐廳晚宴，席間認識了他的好友陳國維夫婦，他對朋友的殷勤好客，可以一覽無遺。

在2007年二月時，朱學兄回雪梨參加一位教友兒子的婚禮，在教會見到他，覺得他面容有點憔悴，消瘦了一點，舉止行動也好像慢了一點，以為是工作過忙，也不以為意，到四月時，接到消息，他患了很後期的肺癌，將回來澳洲治療，我知道情況不樂觀，心情沉重得很。

他在兒子德望工作的醫院接受治療，也是我工作的地方，故每逢是我的工作天，午膳及放工後，都有機會去探望他，見他全無一般癌症病人的愁眉苦臉，抑鬱沉默還是這麼的high spirit，太太EVA更每天早出晚歸，寸步不離的侍候在傍，在朱學兄的整個療程中，可以看到神是怎樣的帶領他，首先在取活組織細胞檢查中，醫生的針刺穿了一條血管，引致大量體內流血，醫生建議要立即開刀止血，德望堅決反對，認為父親身體太弱，不可承受這手術，結果轉送到深切治療部，除了輸血，並用藥物使他昏迷數天，我在ICU遠遠的望到他，插了喉，危在旦夕，後來流血漸漸止了，到我們去探他時，見他坐在椅上用手提電腦回電郵，連醫生也訝異他的康復。

到學兄要接受化療的一天，醫院一切已準備好，醫生問他：「你對這治療有信心嗎？」他說：「我很害怕，沒有信心。」結果醫生改給他服特效藥免受化療的痛苦，這藥物初期很有效，癌細胞小了，朱學兄並為此去很多教會作見證，也在12月時參加了雪梨同學會的聚餐，並講述自己的經歷，最難得的是他有健康於十二月聖誕期間與家人兒女孫兒一共十幾人參加了一個大郵輪的船河（CRUISE），與家人渡過了很珍貴的時刻，拍了很多珍貴的照片。

今年二月，朱學兄的病情開始惡化，癌細胞已擴散至骨，開始舉步難行，要再次入院，當我收到培正同學通訊，看見銳社金禧通告，不禁一陣心酸，心想恐怕學兄沒有機會參加了，我一早已安排了與先生三月回港一行，有點擔心學兄在這段日子病情有變化，在起程前曾到醫院探他，想不到這是最後一面，在香港期間接到兒子來電，知道學兄已於三月十五日離世，舉行喪禮那天剛好是我們回澳的一天，我們早上10時半抵家，11時半開始喪禮儀式，時間的緊接使人難以置信，若不是因為復活節期近機票問題，我們本打算遲一天回澳的，那時便趕不及了，學兄的好友陳國維（銳社）夫婦也特地從香港來參加喪禮。

在喪禮完畢後，在教堂舉行了一個感恩崇拜，中西人仕，有數百人之多，他兒子德望說了一篇很感人的致詞，他說今次父親的病，使他更認識他，看到如雪片飛來的慰問咭，從世界各地寄來的電郵，及探病人數之眾，想不到父親對別人的影響力是這麼的大，他實在為有一位這樣的父親感到驕傲，以他為榮，又看見父親對神的信心，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要繼續發揚聖工。

雖然神最終沒有醫治朱學兄，但整個療程都無受很大

痛苦，去世時是多麼的安祥，他面對死亡的勇敢，實在給我們很大的啟示，雖然身為基督徒，當有日面對這人生必經之途時，難免有懼怕、憂慮，但學兄在最後的日子，仍是這麼的灑脫，並以輕鬆的口吻對人說：「醫生已判了我死刑喇。」有一位做律師的教友來探他，他還開玩笑的說：「你來是要我簽遺囑嗎？」他表示神若能醫他，是要使用他，若神接他回天家，他亦一樣接受，他面對死亡的態度，實在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在解慰酒上，看到朱學兄六歲小孫兒但以理，忙着為我們拍照，拉着他的小手，柔聲問他：「你懷念你的爺們嗎？」他說：「我懷念他，不過不要緊，在我死後，我會在天家與他相見。」小孩子天真無邪的答話，那種堅定的口吻，卻為我們帶來無比的鼓勵。

別了朱柏濂學兄，雖然你的身軀離開了我們，但你的精神，你的音容笑貌，將會長留在我們心間，深信有一天，正如小但以理所說，會在天家相見。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7 March 2008 Thursday

timelines@smh.com.au 9282 2741

Professor a visionary in the field of fibre optics

PAK-LIM CHU
1940-2008

AFTER 30 years of teaching fibre op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NSW, Professor Pak-Lim Chu had rows of student theses on his bookshelf. He was so proud of the work he had had it bound, and took it to Hong Kong when he moved to City University there in 2001.

Chu set up the first fibre optics laboratory in Australia, at the University of NSW, in the late 1970s, and made extensive contributions to optical fibre technology. He published more than 400 papers of his own and held five patents.

He was always at the forefront of his field. His university laboratory had the latest equipment, much of it in Austral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1980s he invented a method to measure the refractive-index profiles of fibre preforms, that is, measure the potential light-wave angles of material then used to make fibre optics. This has been adopted commercially.

He solved the problem of soliton interaction, to keep light waves within fibres from moving together. This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oliton communications – a form of optical transmission that enhances the signal-carrying capacity of an optical fibre.

Chu also worked on many innovative optical devices, such as non-linear optical switches to move fibre signals between channels, polymer-fibre Bragg gratings to block selected signals within a fibre, and waveguide couplers to bring optical signals together, all of which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His work on chaos communications was highly influential and Chu promoted polymer optical-fibre technology, which is cheaper than glass and ha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short-distance transmission and optical sensing.

Pak-Lim Chu, who has died of cancer at 68, was born in the village of Taish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is father left the country soon afterwards to do



At the forefront ... Pak-Lim Chu.

manu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family. In 1949 his mother moved Pak to Hong Kong, where he went to school. His father applied for the family to move to the US but was refused, when Pak applied to study in the US he was also refused. The Canadian consulate turned him down but suggested he try Australia.

Arriving in 1959, he was accepted almost immediately by the University of NSW. He had trouble with his lectures before he became attuned to the Australian accent but soon settled in. He also became a devout Christian, helping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Australia and the West Sydne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hu graduated as a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with honours then did his master of engineering and PhD degre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efore starting work at the university. In 1967 he married Eva Lai, a music student from Hong Kong.

Over the years he tried for tourist visas to visit his parents, who were both by then in the US. He was refused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it was only after he became an Australian citizen in the early 1970s that he was able to visit them – about 30 years since he had last seen his father in China.

Pak-Lim Chu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Eva, their daughter Evelyn, son Desmond, his son- and daughter-in-law and five grandchildren.
Harriet Veltch

(澳洲悉尼報章訃告報導)